

历史

新切尔卡斯科事件的定性 及其对苏联历史的影响

张丹

【内容提要】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发生了多起社会骚乱，新切尔卡斯科事件是规模最大的一次。1962年6月1日，苏联政府提高食品价格的消息引发新切尔卡斯科市工人大罢工。该事件不是官方定性的“流氓刑事犯罪分子组织的土匪行动”，而是“工人自发性请愿运动”。这一事件对苏联历史影响巨大，它是苏联政府解决民生问题的转折点，也促使国家加强了对社会的管理力度，还使民心发生了转向。

【关键词】苏联 新切尔卡斯科事件 土匪行动 请愿运动

【中图分类号】K512.5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1094(2016)05-0028-0007

赫鲁晓夫执政期间发生了多起社会骚乱，新切尔卡斯科事件是规模最大的一次。1962年5月31日，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颁布决议，从6月1日起将肉类、肉制品的零售价格平均上调30%，动物油的零售价格平均上调25%^①。涨价消息于6月1日向全民广播时，引发罗斯托夫州新切尔卡斯科市电力机车制造厂工人的不满，他们于上午开始罢工，到厂部解决生活问题未果。第二日，约8000名群众^②汇集到市委大楼前再度请愿，政府派出军队向群众开火。事件造成23人死亡，87人受伤，死伤者大部分是18—25岁的青年^③。事发时政府严格封锁消息，无论是当地报纸还是中央媒体均只字不提。除个别地方有所传闻外，国内外几乎都不知晓。20世纪80年代末期，戈尔巴乔夫提出政治公开性、不留历史空白点原则，一些记者、研究人员及官方机构开始介入调查新切尔卡斯科事件，真相慢慢浮出水面。

近年来中国已有学者涉及这一问题，重在将其作为一个群体性事件介绍经过、政府处理措施及应汲取的教训^④，对事件的内容较少辨析和研究。《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的第28卷，也已将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向苏共中央呈递的关于事件始末及处理情况的若干文件译成中文^⑤。在笔者看来，这

① Трудовые конфликты в СССР. 1930-1991.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и документов. М., 2006. С. 317.

② Эрик Кулевиг. Народный протест в хрущевскую эпоху. М.: АИРО-XXI, 2009. С. 173.

③ Трудовые конфликты в СССР. 1930-1991. С. 337, 338.

④ 参见徐元宫：《鲜为人知的苏联工人罢工事件》，载《同舟共进》2013年第6期；徐元宫：《后斯大林时期苏联群体性事件及其应对措施和教训》，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3年第4期；李华：《1962年前苏联处置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历史教训》，载《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李华：《苏联“刚性维稳”的代价与教训——基于四起重大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分析》，载《西伯利亚研究》2015年第5期。此外，闻一在《俄罗斯通史：1917—1991》（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年版）一书中也简述了这一事件，并从三个方面分析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⑤ 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8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61—550页。

【作者简介】张丹，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一事件尚有深入探讨的空间：该事件是官方定性的“流氓刑事犯罪分子组织的土匪行动”还是旨在改善民生待遇的“工人自发性请愿运动”？它对苏联政府解决民生问题是否有所推动？政府武力平息“土匪行动”的处理方式对苏联社会又带来怎样的影响？本文将根据俄联邦国家档案馆的解密档案、事件目击者的回忆，结合苏联官方的表述，尝试回答上述问题。

一、新切尔卡斯克事件性质再探讨

苏联政府将此事定性为“流氓刑事犯罪分子组织的土匪行动”，事关重大，本文首先来澄清这一问题。

食品涨价决议颁布后，国家安全委员会于1962年6月1—3日，先后向苏共中央递交了4份关于各地群众情绪的报告^①。其中自然涉及“闹得最凶”的新切尔卡斯克市。6月1日的汇报这样记载：“……流氓分子开始活动，他们毒打两名工人，号召大家进行大破坏。”^②6月2日的报告继续写道：“22名领头闹事的人被拘留……将近8时，第一班的工人……开始上班，但是由于受到捣乱分子的影响停止了工作。”^③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出，国家安全委员会对事件的判断带有一定的倾向性。他们认为骚乱是有人挑唆的，流氓捣蛋分子是挑唆者。6月3日，亲临骚乱现场的苏共中央书记Ф.Р.科兹洛夫在新切尔卡斯克地方广播电台发表讲话，也表达了类似看法：“同志们，我们有信心查明导致如此严重局势的原因。但是现在就可以断言，一些流氓分子是骚乱的教唆者……这些行为旨在反对人民国家的利益。”“你们城市一些没有觉悟的工人受流氓分子的挑动……”，“一小撮流氓、酒鬼和挑拨离间者带领一些不明真相的人”^④……。讲话都在阐发“骚乱是流氓分子教唆的”观点。由此可知，在罢工尚未结束、更没有展开深入调查之际，中央就已经“先知先觉”地对事件性质下了定论。持续了三天的骚乱结束后，7月13日，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B.E.谢米恰斯内和苏联总检察长P.A.鲁坚科向苏共中央委员会呈递的报告中这样写道：“经侦查证实……一小撮流氓刑事犯罪分子和贪图私利者利用一些工人提出的合理要求，挑起骚乱……在这次有组织

的土匪行动中，最积极的教唆者和参与者有……”^⑤在同时递交的起诉书草案中，官方明确地告诉人们，14名被告是“发生在新切尔卡斯克市的大规模骚乱、土匪行为和破坏活动最主动的参与者和组织者”^⑥。

综合苏共中央委员会、国家安全委员会和苏联总检察院大同小异的言论，可以明显地判断出官方的立场，即认定该事件是一起“流氓刑事犯罪分子组织的土匪行动”，旨在损害国家利益。那么，真相究竟是不是这样呢？

这场运动是不是一起有组织的土匪行动，可以依据苏联政府在1960年10月27日颁布的俄联邦刑法典进行判断。第77条关于土匪行动的条款是这样规定的：组织武装团伙袭击企业、机构、组织或个人，以及参与该团伙并采取袭击行动，判处3—15年监禁并没收财产，或判处死刑并没收财产^⑦。按照该刑法第17条第1款的规定，确定犯罪团伙“组织性”的条件是“这是一个稳定的团伙，为实施一项或几项犯罪预先联合起来”^⑧。刑法典还解释，把某种行为列入“土匪行动”的首要条件是被告使用武器^⑨。

对于官方认定的14名组织者，无论侦讯机关的侦查、本人的口供、证人证词，均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们为策划这起骚乱预先串联起来、配备枪支弹药准备采取袭击行动，更遑论团伙的稳定性了。相反，事件的起因和进程都表明这是一场群众自发性请愿运动，旨在改善民生条件。

事发前，该厂工人的生活已十分困顿。1962年初，该厂的行政管理人员重新审核了工作定额，一些工种的工资下调了30%^⑩。而赫鲁晓夫实行的错误农业政策也殃及该市，商店里肉类短缺，买土豆要在夜里一点排队，甚至有人吃烤土豆皮。5月初，该厂又一次降低了计件工资并提高工作定额，

① 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8卷，第463—474页。

② 同上，第464页。

③ 同上，第466页。

④ 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8卷，第475页。

⑤ Трудовые конфликты в СССР. 1930–1991. С. 343.

⑥ 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8卷，第503页。

⑦ Уголовный кодекс РСФСР от 27 октября 1960 г. <http://base.garant.ru/10107062/7/>

⑧ Уголовный кодекс РСФСР от 27 октября 1960 г. <http://base.garant.ru/10107062/3/>

⑨ Козлов В. А. Массовые беспорядки в СССР при Хрущеве и Брежнев (1953–начало 1980–х гг.). М.: РОССПЭН, 2009. С. 494.

⑩ Там же. С. 414.

这使工人特别是成家的工人无法承受。因为即使物价不上涨,他们的微薄薪水从这个月维持到下个月也已经很艰难了^①。6月1日这一天,不久前刚刚降低工资的工人们又听到了物价上涨的消息,这不啻于火上浇油。正是“涨价”成为罢工的直接原因。按照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汇报材料,这一决议在全国多地都引发了不满情绪,而电力机车制造厂的反应是最激烈的。还有两个附加因素成了事件爆发的导火索。一是电力机车制造厂行政部门的不明智做法。他们于物价上涨的同一天宣布下调计件工资,这“一涨一降”的两面夹击让工人忍无可忍。二是厂长Б.Н.库罗奇金的官僚作风。他拒绝倾听工人的抱怨,告诉他们:“没有钱买肉和香肠,就吃下水馅烤饼吧!”^②这句冷漠且略带嘲讽的话语激怒了工人,导致罢工规模扩大。这些消极因素在同一天叠加在一起,摧毁了工人对生活的希望。于是,义愤填膺的工人们不约而同聚集到厂部,向对自己利益漠不关心的厂长发出解决民生问题的呐喊。

市委大楼前的流血惨案更能反映事件的性质。由于厂部请愿未果,几名参与者随即提议到市委集会。6月2日,陆续有群众加入的游行队伍赶往市委,进行和平请愿。而集会的结果却是,政府派军队向这些手无寸铁的工人开火,23名死者均是请愿群众,官方无一人死亡^③。因此,将这一惨案定义为武装团伙袭击市委实在是没有道理的。此外,与国家安全委员会强调这次集会的进攻性并将参与者描绘成土匪不同,多名目击者都证实,市委大楼前的集会是一场和平请愿运动。作家С.波多尔斯基将参与群众描述成和睦友好的、可敬的、充满自信的公民^④。当时还是五年级学生的В.В.康德拉舍夫证实,游行队伍到达市委后,几名参与者轻松地走进大楼……在集会者中没有发现一起暴力或野蛮行为^⑤。法学家С.奥格涅索夫也认为,当时没有发生任何群众骚乱,相反,这是一场和平行动^⑥。

对于官方坚决认定事件是由流氓刑事犯罪分子组织的,并确认14名成员是“最主动的参与者和组织者”,可以借助1962年7月13日谢米恰斯内和鲁坚科向苏共中央提交的备忘录,为这些组织者进行身份鉴定。备忘录中详细介绍了这14名“主谋”的履历,从就业情况来看,他们中有4名钳工,2名车工,1名国营农场职工,1名学生,1名电工,

1名厨师,1名保安,1名装卸工,1名清洁工,1名拖拉机手。14人全部是普通的劳动者,且工人居多。再从是否有犯罪前科的情况来看,14人中5人有前科,其中А.А.科尔卡齐曾犯有“非法滥用职权罪”,Е.П.列夫琴科曾犯有“盗窃罪”。从以上情况可知,这些组织者中无前科的良民占绝大多数,有前科者也很少犯有极其严重的刑事罪行。可以说,14名组织者基本是无任何罪行的工人。在戈尔巴乔夫实行政治“公开性”原则之后,当年参与罢工的许多目击者都证实,这些“主谋”是工人和市民^⑦。

将这份备忘录与一个月前谢米恰斯内给赫鲁晓夫的报告对比时发现,由同一人提交的两份文件对3位犯人的前科记录差别很大。如在6月份的报告中,А.Ф.扎伊采夫曾犯有“偷盗、流氓行为和酗酒”罪行,而在7月份的文件中他的前科罪行变为“侵吞社会财产罪和恶性流氓罪”;Б.И.莫克罗乌索夫由“临阵脱逃、从劳改营逃跑、盗窃罪”变为“严重伤害他人身体并危及生命罪、侵占国家财产罪”;М.А.库兹涅佐夫由“偷盗罪”变为“侵占国家财产罪和盗窃罪”^⑧。显而易见,后者的罪行比前者要严重得多。这3人日后均遭到最严厉的惩罚——被枪毙,国家没有公布3位犯人后来罪名的证据,这说明是为重判“主谋”而刻意篡改了他们的前科罪行。

综上所述,在这场自发组织的运动中,连政府认定的最积极参与者和组织者也大多是没有罪行记录的普通工人。由于巨大的生活压力,他们被迫到厂部、到市委大楼前请愿。工人打出的“肉,奶,提高工资”^⑨、“我们要住房”^⑩的标语,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利益诉求,这场运动的目的是为了改善生活条件。笔者认为,新切尔卡斯克事件是一

① Козлов В. А. Массовые беспорядки в СССР при Хрущеве и Брежнев (1953—начало 1980-х гг.). М.: РОССПЭН, 2009. С. 416.

② Дамье В. В. Стальной век: Социальная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М.: Книжный дом «ЛИБРОКОМ», 2013. С. 223.

③ Козлов В. А. Массовые беспорядки в СССР при Хрущеве и Брежнев (1953—начало 1980-х гг.). С. 474.

④ Эрик Кулевиг. Народный протест в хрущевскую эпоху. С. 168.

⑤ Там же. С. 168, 169.

⑥ Там же. С. 169.

⑦ Там же. С. 164.

⑧ 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8卷,第495、496页。

⑨ Козлов В. А. Массовые беспорядки в СССР при Хрущеве и Брежнев (1953—начало 1980-х гг.). С. 420.

⑩ [俄]亚·维·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年)》,吴恩远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3页。

场为维护民生权益自发的群众反抗运动。官方的定性是不妥当的,其派兵、武力镇压请愿运动,且在日后为自圆其说,联合检察院和法院伪造罪行、制造出14人犯罪团伙并采取严惩的处理方式更是错误的。

二、事件对苏联经济与社会政策的影响

新切尔卡斯克事件规模巨大。据目击者回忆,约有8000名群众参与市委楼前集会,而枪杀案过后大街上聚集了约2万人^①。这场因民生问题而起的事件强烈震撼了苏联政府,换来了罢工群众物质生活的迅即改善。6月3日,在运动尚未结束的时候,长期空空如也的商店里就充满了食品和各种日用品。科兹洛夫还向群众保证,取消刚刚实行的关于降低工资的规定^②。但这一事件的作用绝不仅仅局限于此,它更深远的意义在于,苏联领导人从中意识到提高物质福利是人民支持制度的最重要基础,为了稳固执政根基,必须调整社会经济政策,向人民做出让步。此后,赫鲁晓夫及其继任者都开始高度重视民生问题。勃列日涅夫当政后的主导思想之一,就是持续关注劳动人民的物质福利。对此,俄罗斯学者也指出,新切尔卡斯克事件后,苏联社会在整整20年时间里处于“特殊的社会妥协”时期^③。

之后,政府开始从国外进口粮食。提高食品价格虽有助于发展农业,但会引发城市居民的反抗。在这个“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④的时代向农村强迫征粮又是不合时宜的,压缩粮食供应量也是不明智的。为了解决食品短缺问题,赫鲁晓夫被迫决定进口粮食。1963年,苏联动用黄金储备,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西欧等国家和地区进口粮食,从澳大利亚和南美进口肉类,从新西兰进口黄油,从北欧国家进口家禽^⑤。自此以后直到国家解体,苏联的粮食进口量逐年增加,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粮食进口国。

政府还尽量控制食品价格上涨。为了保证工人的购买力,政府在进口食品的同时,还通过给予补贴将食品价格控制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上。虽然除大城市外在商店里较难买到商品,但是市场价格的浮动始终受到官方的抑制,食品也时常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售^⑥。

国家也不再大力提倡增加工作定额。这种通过打破旧定额、创造新定额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举措,始于二五计划时期开展的斯达汉诺夫运动。由于工业体制改革成效甚微,赫鲁晓夫政府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重拾过去的老办法。电力机车制造厂在1962年上半年不断提高工作定额、降低计件工资,这成为事件中引发工人不满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平息骚乱之后,国家在这方面也进行了调整,不再大力倡导这种竞赛形式,能够容忍相对较低的工作定额。导致劳动生产率下降的原因固然是复杂的,但较低的工作定额无疑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从此,直到苏联解体,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在不断下降。官方资料显示,1966—1970年,劳动生产率的增速是37%,1971—1975年是23%,1976—1980年是17%,1981—1985年是16.5%。相较于苏联官方的统计数据,国外学者的非官方资料和统计数据则低很多,1960—1970年年均生产率增速为1.5%—3.4%,1970—1980年为0.4%—2.4%,1980—1987年为-0.1%至1.1%^⑦。

总之,新切尔卡斯克事件对苏维埃政权最后几十年的民生环境影响颇深。虽然苏联政府并没有透过请愿运动认真反思自己在工农业政策上的失误,所以也就无法从根本上推动民生问题的解决,但是,相较于之前几十年人民的物质利益受到忽视的情形来说,这些惠民措施已是一个重大进步。国家动用黄金储备、给予食品补贴、容忍较低工作定额,这是前所未有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新切尔卡斯克事件可谓苏联政府解决民生问题的一个转折点。

三、事件对苏联政府社会调控的影响

在苏联领导人心目中,政府代表了苏联,新切尔卡斯克工人反对政府决议的罢工和请愿行动,就是反苏性质的,应该动用专政力量惩治。在武力平

① Эрик Кулевиг. Народный протест в хрущевскую эпоху. С. 172.

② Там же. С. 171.

③ Дамье В. В. Сталинский век: Социальная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С. 225.

④ 出自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上的讲话。引自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苏联兴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45页。

⑤ 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苏联兴亡史》,第552页。

⑥ Дамье В. В. Сталинский век: Социальная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С. 225.

⑦ Там же. С. 225.

息所谓“土匪行动”后,1962年6月10日,Ф.Р.科兹洛夫向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汇报了这一事件的处理情况。会议草稿记录显示,Н.С.赫鲁晓夫、А.И.米高扬、Л.Ф.伊利乔夫和Ф.Р.科兹洛夫都认为“我们很好地采取了行动,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大多数人都是支持我们的……这件事暴露出了我们工作中的弱点,巴索夫同志是一名软弱的工作人员。结论是改进我们的工作,加强国家安全委员会机关的工作”^①。从记录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央对于镇压罢工运动是持完全正面的评价和充分肯定的态度的。1962年事件中参与阻止火车前进的Е.埃林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事件表明,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掌权者在任何流血面前都不会罢手的”^②。政府对这一事件的定性以及对处理方式的肯定,对日后调控社会矛盾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成为苏联当局处理类似事件的标准模式,那就是先将其定性为反苏性质,武力镇压,而后开展更广阔范围的与反苏分子的斗争^③。

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后,“加强与反苏分子做斗争提案起草委员会”成立。1962年7月19日,该委员会撰写的关于加强同反苏分子及个别群众骚乱活动做斗争的若干提案正式公布。从这些内容来看,国家的确是“改进了自己的工作”,它扩大了斗争对象,调动全部强力机器对可能危及社会秩序和国家安全的一切活动均严格监控。

首先是扩大特殊身份证区域,加强对有前科人员的管控。“鉴于近年来俄联邦南部一些地区集中了大量刑事罪犯,而且这类判刑人员在这些地区的集中趋势将继续下去”,提案起草委员会建议苏联部长会议颁布决议,在一些南方城市推行特殊身份证制度。7月19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Н.С.赫鲁晓夫和苏联部长会议办公室主任Г.斯捷潘诺夫共同签署决议,将公民身份证条例第40条中,因“犯罪被监禁或流放的人员”不予在身份证上进行居住登记的城市再添加12个,罗斯托夫州的新切尔卡斯克、塔甘罗格和沙赫特都在其列^④。

其次,改进、加强国家安全机关同骚乱和反苏分子做斗争的技术手段,增加监控力量和扩大监控范围。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В.Е.谢米恰斯内下令,要求国家安全机关“积极利用侦讯技术设备及户外监视仪器装置”,加强揭露并制止国内反苏分子的敌对活动^⑤。还要求各共和

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边疆区和州国家安全委员会管理局负责人在一个月之内必须亲自审查下属机关在侦讯行动方面的动员准备情况,每个机关均应制定应对群众骚乱的计划。计划要同州党委、边疆区党委及加盟共和国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负责的坚决制止发生骚乱的预定具体措施协调一致,可以动用国家安全委员会、内务部机关内所有人力和财力,甚至预备役国家保安人员及人民纠察队^⑥。为壮大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监控队伍,中央批准其将克格勃本土部门反间谍分部现役军人编制扩大400名^⑦。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还指示,要在一些重要的企业中“组织好情报侦讯工作”,“注意力集中在及时制止反苏分子煽动群众骚乱,进行公开的反苏活动上”^⑧。第二总局,共和国、边疆区、州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家安全委员会分局应加强在高校、中等专业技术学校中的情报机构的工作,特别是在那些有从资本主义国家来的留学生学习的学校^⑨。由这些内容可知,从中央到地方的安全委员会系统协调一致,动用一切刑侦设备和安保资源,全力制止骚乱及反苏分子的敌对活动。对重要的企业甚至中高等学校都要侦察。

最后,提高检察机关的主动性。苏联总检察长下令,各共和国、边疆区、州检察长要亲自去国家安全委员会各机关及内务部熟悉有关材料,共同拟定措施加强同犯罪行为做斗争^⑩。

以上三项举措表明,平息骚乱后,政府并没有对事件背后反映出来的政府工作失误做出深刻的反

① А. В. Барсов时任苏共罗斯托夫州委第一书记。6月1日民众到厂部请愿,来自州和市的党政领导一直躲在厂部的厂长办公室里不与群众见面,也没有采取任何果断措施维持秩序。后来,迫于群众强烈要求领导讲话的压力,巴索夫在阳台向大家讲述涨价决议的实质。他刚说几句话人群就大喊起来:我们已经读过了决议,我们自己都是识字的,你告诉我们,我们以后怎么生活,工资降低了,而物价上涨了。См.: Трудовые конфликты в СССР. 1930-1991. С. 329-330, 336.

② Дамье В. В. Сталинский век: Социальная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С. 224.

③ 闻一:《俄罗斯通史:1917—1991》,第393—394页。

④ Совет Министров СССР.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от 19 июля 1962 г. N 778. о дополнении статьи 40 положения о паспортах. http://www.libussr.ru/doc_ussr/ussr_5860.htm

⑤ 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8卷,第529页。

⑥ 同上,第532页。

⑦ 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8卷,第525页。

⑧ 同上,第530页。

⑨ 同上,第531页。

⑩ 同上,第534页。

省,相反,它大大加强了对社会的管控。

四、苏联社会出现民心转向

在政府采用暴力手段处理请愿运动的过程中,三个因素促使社会心理发生了变化。一是苏联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从电力机车制造厂厂长Б.Н.库罗奇金让工人“吃下水馅烤饼”的嘲弄话语,到“软弱的”罗斯托夫州委第一书记А.В.巴索夫照本宣科被罢工群众轰下台,再到多位中央主席团委员亲赴骚乱现场,却自始至终没有走到群众中去的做法都可以证明这一点。特别是市委大楼前的枪杀案后,群众高呼“让米高扬到这里来!让他看一看这里的血!”^①尽管这样,米高扬还是没有出现。只有“一架直升巡逻机在广场上低空盘旋……然后飞走了”^②。苏共各级官员的“不亲民”表现让罢工群众非常愤怒,使人民认识到他们不是我们的公仆,他们与我们不是同路人。二是苏联政府调集坦克平息运动。当时的青年人只有在关于法西斯敌人的电影里才会看到坦克,而政府却把坦克开到了一座和平的城市,对准自己的同胞^③。坦克的出现使人们感到,苏维埃政府不是站在人民一边,相反,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成为了人民的敌人。三是市委楼前请愿时军队向人民开火。执政者枪杀的不仅仅是罢工者,他们枪杀的是苏联工人政权的神话。

在骚乱之初谴责罢工者、衷心拥护政权,后来被政府开枪的消息震惊,无法克制自己的愤怒。人们这一普遍的心理过程揭示了新切尔卡斯克事件最重要的影响:甚至连那些从未有任何反苏倾向且起初也谴责罢工者的人,都脱离了政权^④。在罗斯托夫州的泽尔诺格勒市,关于新切尔卡斯克的传闻给机械厂磨工М.П.巴斯卡科夫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6月4日和6日散发传单,谴责政府用坦克和武器镇压手无寸铁的和平居民,指出只有在资本主义国家及在沙皇俄国时期才会采取这样的做法。政府害怕自己勇敢诚实的俄罗斯人民……我们的政府应该感到耻辱和羞愧。这个污点拷问你们的良心,你们无论如何也无法洗刷掉它,最终将不得不向全体人民交代^⑤。能源工业国家设计院新切尔卡斯克分

院的高级工程师Н.П.布列季欣也是一例。按政治忠诚度来说他是一名标准的“苏维埃人”,工程师没有参加骚乱。但是,在几位同志相继讲述枪杀事件后,他“从桌子后面站起来,摘下了赫鲁晓夫的画像,把它扔到院子里”^⑥。北高加索军区副司令员、老共产党员、苏联劳动英雄М.К.沙波什尼科夫于1962年7月在自己的住宅里撰写了反苏内容的呼吁书。信中谴责对新切尔卡斯克的枪杀,指出必须建立布尔什维克工人党的政治组织……用和平道路夺取政治权力^⑦。

由以上史料可知,政府对事件的处理做法确实触及到了人民的内心深处,无论是普通工人还是高级知识分子、精英阶层,都因此开始发生“心灵的转向”^⑧,与政权渐行渐远。

从对新切尔卡斯克事件性质及影响的研究中可以发现,在这起民生事件中,苏联政府对其错误定性,将“群众自发性的请愿运动”判定为“流氓刑事犯罪分子组织的土匪行动”,从而将事件的主要矛盾由“人民对政府的问责”转化为“中央及人民大众对流氓分子的惩治”。通过这种移花接木之术,政府回避了关键问题,掩盖了自己经济政策的失败。而在武力镇压运动之后,政府同样没有认真反省导致骚乱的根源,相反,它充分肯定了自己的镇压方针,还加大了对社会的管控力度,继续采用高压手段。事实证明,这种方式并没有换来社会的安宁。在苏维埃政权以后的年代里,群众反抗运动仍时有发生。(责任编辑 新会新)

① [俄]亚·维·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年)》,第104页。

② [俄]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下),田大畏等译,群众出版社2007年版,第634页。

③ Козлов В. А. Массовые беспорядки в СССР при Хрущеве и Брежнев (1953—начало 1980-х гг.). С. 446.

④ Там же. С. 484—485.

⑤ Там же. С. 481.

⑥ ГАРФ. Ф. Р-8131. Оп. 31. Д. 98310. Л. 4—5. См.: Козлов В. А. Массовые беспорядки в СССР при Хрущеве и Брежнев (1953—начало 1980-х гг.). С. 472—473.

⑦ ГАРФ. Ф. Р-8131. Оп. 36. Д. 1808. Л. 5—6. См.: Козлов В. А. Массовые беспорядки в СССР при Хрущеве и Брежнев (1953—начало 1980-х гг.). С. 483.

⑧ Дамье В. В. Стальной век: Социальная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С. 224.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Nature of Novocherkassk Event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Soviet Union History

Zhang Dan

Abstract: Several social riots occurred in the ruling period of Khrushchev, and the Novocherkassk Event is the largest one. On June 1, 1962, the notice of Soviet Union government to increase the price of food triggered the worker's strike in Khrushchev. This event is not the officially stated "bandit action organized by rogues and criminal offenders", but the "spontaneous petition of workers". The event has huge impact on the history of Soviet Union. It is the transition point for the Soviet Union government to solve the livelihood issues, also promotes the country to strengthen the management force to the society and causes the diversion in the popular support.

Keywords: Soviet Union; Novocherkassk Event; bandit action; petition

Определение Новочеркасского инцидента и его влияние на историю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Чжан Дань

【Аннотация】 В период правления Хрущева в стране неоднократно возникали социальные волнения и самое крупное из них произошло в городе Новочеркасске. 1 июня 1962 года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объявило о повышении цен на продукты питания, что привело к крупной забастовке рабочих в Новочеркасске. Данное событие было официально определено не как "организованные бандитские действия хулиганов и уголовных элементов", а как "спонтанное петиционное движение рабочих". Это событие в дальнейшем оказало огромное влияние на советскую историю, стало поворотным пунктом в решениях, принимаемых советским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м по проблемам народного благосостояния, подтолкнуло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к усилению социальн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обществом, а также изменило ожидания и чаяния народа.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Новочеркасская трагедия; бандитские действия; петиционное движение